《漂木》时，都谈到诗歌的永恒性、时间的不变性的问题。

在工业化时代前，很多大作家并没有得什么奖，但是，他们作品的光辉却穿透时间的屏障闪耀到今天乃至于未来。现代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各式各样的文学奖项林立，很多奖项却是设奖人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产物，或者是另外的人为奖项的冠名者铸造在坟茔前闪光的墓碑，那些另外的人要么是有钱，要么是有权，甚至是以国家的名义。当然，应该承认，他们大都是在为人类的理想事业做出贡献。然而，一些奖项的狭隘和被商业及政治浸蚀利用是显而易见的。

很欣赏中国目前惩治贪官的异地审判，你在甲地犯案，将你弄到乙地进行审判。要是当年蒋经国在上海肃贪的时候也能够学到今天共产党的这些手段，恐怕国民党和共产党会在长江对峙，改写中国近代史。

文学能否做到异地评判呢？那可能只是一个理想。

因此，现存世界的任何一个文学奖项，都不能够说在空间和时间上经得住考验而无懈可击。

我们相信什么呢？也许，只有时间能够给我们满意的答案。

我相信，有一天，今天在中国盛行的什么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还有法国的钢琴家克莱德门这些类似的人物，将会在中国人心目中回归到他们的真实的地位。因为，今天已经在逐渐开放的中国社会，将让我们中国人看见那些至今还没有看见的、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值得借鉴的伟大和高级的东西。而在此前，尤其是在文革，我们只看见了一个歪曲的、可怕的“伟大”。而一旦真的“伟大”显身的时候，倒被认为是我们中国经验里“伟大的”的这个，“伟大的”那个。

这里，还引申出我对“伟大的中国小说”的一个建议，那就是时间检验的问题，当然，不是修改这个定义，因为定义已经很宽泛，只是在具体考虑什么是伟大小说的时候，注意时间的因素。因为，当代人去评判当代人的成就，尤其是长篇小说这样讲述人的命运的文学形式，原则上讲，只能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标准。如果真要严格接受时间的检验，一来现在一些得奖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二来那也是后人的事情了。好在，文学评判不是修史，修史就更要讲究时间性了。特别是党派之争的情况之下，历史是没有办法做到公正的，那就只能让后人去写。

正如牛顿没有被爱因斯坦消灭，而是被爱因斯坦提升，荣格没有打垮弗洛依德，而是将其理论体系扩充一样，他们不仅是尊重了人家的发言权，也保存和发展了自己的多元性。所以，才有至今仍旧被文学界尊为楷模和典范的那些18世纪的法国文学、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20世纪的美国文学里的伟大作品。才有至今在英国都还保留的《伟大的传统》里主要的合理部分，才有在美国的大学课堂上可以教学生学习怎样写“伟大的美国小说”。

欧洲文学的传统早已经形成。19世纪末树大根深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连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帝国随着阿芙罗尔号巡洋舰上的一声炮响而夭折于20世纪初的苏维埃革命，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肖洛赫夫、索尔仁尼琴乃至于后来的领军人物邦达列夫等作家显然不能望托尔斯泰、妥斯托耶夫思基、契诃夫等人的项背，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飞翔的天空。池田大作和汤因比对话时说，“俄苏文学自妥斯托耶夫斯基以后，经过苏联文学至今，再没有产生过一个妥斯托耶夫斯基那样伟大的作家。”这个结论，已经是摆在面前不争的事实。

20世纪的美国文学正值鼎盛，但是，由于美国的历史相对短暂，它的文学的传统还没有像欧洲文学那样形成传统，还在一个形成传统的过程或距离之中，所以，美国文学界认为，他们的“伟大的小说”还没有写出来，他们还在课堂上年年教学生去写“伟大的小